

文化緬懷空間與人文北京

——從受傷城市到後殖民的文化醫治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摘要：中國古都北京，近代曾承受過被侵略、內鬥及發展改變帶來的創傷。但中國在當前已發展成功，有能力改變困境，故可將傷痛轉成幸福，那就是建立文化緬懷的城市歷史空間，以歷史文化建造不同地標空間，建立一個人文北京。

關鍵詞：創傷，公眾空間，人文北京。

「受傷城市」與後殖民城市思考

當前分析城市的思想中，有一些學者提出「受傷城市」的分析框架，紐約城市大學學者Ida Susser與Jane Schneider指出「受傷城市」的理念，是在城市研究中，提供一個分析城市內涵的架構，「從兩個相反而又不可能化約的觀點去將城市概念化。一方面視城市是一個政治全體，可以集體地受傷及回應這傷。另一方面城市是強大外力所交叉影響的地方，故此會加速城市群體的差異和衝突」^[1]。

綜合各方研究，受傷城市有四個維度：

1. 戰爭衝突的歷史創傷

自從二〇〇一年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紐約市嚴重受傷，隨之引起的戰爭，如喀布爾、巴格達及被恐怖襲擊的城市如馬德里、倫敦、巴黎、新德里等城市，亦紛紛受

傷。「受傷城市」(Wounded City) 就研究就成為一個課題，如專題研究的書有 *Wounded City, The Social Impact of 9/11* ^[2]出現，深入探討災難對社群整體經驗的影響，瞭解社會數據後面的心靈呼聲，及重建時如何通過城市空間的新設計，來醫治群體的創傷。

2. 發展時的創造性破壞

「受傷城市」的理念，不單來自表面的恐怖襲擊，且是因大都會的發展，及全球化帶來的外國衝擊，形成原本處境的巨變，產生不公義及不公平的事件，使城市不同的群體，無法適應新轉變。如Ida Susser與Jane Schneider分析全球化時代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全球性的大投資轉眼改變城市的原本樣貌，將很多原住在該處的勞工階層趕離。商品化的發展又要僱用大批廉價勞工。這一切都涉及城市的全體政策，亦即城市社會學家David Harvey所謂的全體政治 (body politic)，因著政策無法適應全球化新時代，超大城市無規劃地發展；很多人民在此受苦，生活水平降低，罪案增加，環境污染等等問題。David Harvey指出：「近期全世界城市超常地增長，無視於災難、損失、無尊嚴及傷害」，「因著資本主義的形式，已成為過度活躍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 地方」^[3]。這轉換過程使很多原居民被迫改變生活方式，使整體受到不少傷害。

3. 西方城市規劃模式的惡果

「受傷城市」的理念，不單來自表面的恐怖襲擊，且是因大都會的發展，及全球化帶來的外國衝擊，形成原本處境的巨變，產生不公義及不公平的事件，使城市不同的群體，無法適應新轉變。

當代城市發展帶來的困境，也是來自西方現代化城市規劃帶來的惡果。愛爾蘭地理學家嘉芙蓮迪奧(Karen Till)指出，當代很多後殖民研究學者，挑戰西方所定的城市現代化標準，認為西方有其盲目的偏見，「多數西方為本的城市轉化模式，是懼怕不同的他者(fear of the other)，而渴求秩序(desire of order)……相信只要有一套理性規劃的權力，去解決所有問題，就是將空間秩序化，通過鏟平、分割及劃界，去處理生活中複雜的城市空間、時間及潛能」^[4]。迪魯引述城市與地理學大師Lefebvre之說，城市是oeuvre^[5]，oeuvre指藝術作品，不只是物質的建構，城市是居民所構城，是由其居民持續活動所逐步建構的空間，她綜合指出城市「是人與其他生物共同生活，彼此互動，共同交往所走出，在複雜時空中形成的道路。他們所造成的符號象徵或物質空間，形成人的「身體-自我-環境」^[6]。早期西方的大城市發展，因西方的規劃模式，將空間秩序化，將原本的城市大規模拆遷改建，摧毀居民原來的環境，破壞其符號象徵與物質空間，迪奧認為是居民承受了國家的強暴要求，產生了「受傷的城市」。迪奧說：「我定義受傷城市，是本地密集的居民被傷害，因著物質拆毀，流離失所的特殊歷史，結構成個人與社會的創傷」^[7]。

4. 精神文化的衰敗

更嚴重的問題涉及文化精神的衰敗，城市使人和文化失去靈魂，著名靈修學者Kenneth Leech指出：「在腐爛的內城(inner city)的荒原，訴說著各種淒寂與絕望的陰鬱故事，顯示一個精神上的荒原也在訴說同樣的內容」^[8]。Leech在牛津大學畢業，在倫敦東區與蘇豪區多年在吸毒者中工作，他深切瞭解到，城市已成為一個「精神上的荒原」(Wasteland of spirit)，他又引用Koester的一個名辭：「精神上的冰河期」(Spiritual ice age)。

整體來說，城市受傷，因著歷史發生

的戰亂，因著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帶來城市人口與建築重大變遷，形成創造性的破壞。因著西方城市規劃使人與環境的互動被摧毀，因著精神文化的衰敗，形成居民感情的受傷害，這是全球城市化的共同問題。

北京城經歷的歷史創傷

中國古都北京，近代曾承受過被侵略、內鬥及發展改變帶來的創傷：

1. 外國欺凌入侵

英法聯軍入北京，焚毀圓明園，其後八國聯軍入京，操控一年，全城破壞，再後日本在城外盧溝橋發動侵略中國戰爭，侵略軍佔據八年。這期間北京居民被屠戮壓迫。

2. 建國後的拆城與文革

解放革命成功，全國歡騰，但初期發展時，用蘇聯規劃的模式，拆去城牆及不少城樓，一九五三年，左安門被拆；一九五四年，慶壽寺雙塔被拆；一九五六年，中華門被拆；一九五七年，永定門、廣渠門、廣安門、朝陽門被拆；一九五八年，右安門被拆；一九六五至一九六九年，東直門、宣武門、崇文門、安定門、阜成門、西直門、元城牆被拆。東單和西單的牌樓也消失了蹤跡。這是一新創造，但同時破壞了城牆及很多古建築，且工廠更成為污染的根源。文革時紅衛兵破壞很多有歷史價值的商店及民間建築。北京居民被十年浩劫所凌辱與傷害。

3. 改革後的西方模式規劃

改革使中國發展高度成功，但在北京城現代化發展時，也受了西方規劃的影響，將空間秩序化，鏟平了很多胡同、老街、四合院，只剩下一小部分被保留。可以說是全城面目一新，但也是六百年保存下來的歷史文化，經李自成、滿清、八國聯軍、日軍都均能存活的老北京，估計百分之四十在一九九〇至二〇〇二年大部份被市場經濟與商業利益所取代了。幸好

改革使中國發展高度成功，但在北京城現代化發展時，也受了西方規劃的影響，將空間秩序化，鏟平了很多胡同、老街、四合院，只剩下一小部份被保留。

中國在當前已發展成功，有能力改變困境，故可將傷痛轉成幸福，那就是建立文化緬懷的城市歷史空間，以歷史文化建造不同地標空間，建立一個人文北京。

一九九〇年代也開始有保存地景計劃，舊城有二十五個歷史遺跡被保護，二百六十個胡同，約二千間四合院被保存，大約有二千五百六十五畝地景得到保存，約佔百分之十七。

北京的規劃並未產生西方那種城中心周邊的貧民窟，外來貧困農民工都聚在大城邊緣的城中村，這廣大的城市貧困區雖遠離中心，但如何安定其居所、交通與感情的穩定是一大挑戰。另一方面，對北京原居民來講，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居民面對巨大轉變與遷折，仍造成原居民的感情受到傷害。

4. 精神文化重振未落民間

中國三十多年改革成功，市場經濟成為主流，容易產生貪婪自私及自我炫耀的文化，改革後中國學界很努力重建中國傳統儒道文化的價值，但中國精神文化仍未生根在民間普及文化當中。有權有錢者莫不貪婪自炫，貧困者莫不夢想發財成功，社會豪強壟斷，人心鮮廉寡恥，精神文化只留在學府與書本，古城仍未重建精神文化的風采。

在近代歷史的發展中，北京經歷過被外國欺凌，又經內戰與內鬥的破壞，到當代成功發展時，帶來的變遷與折毀，均形成對居民不同的衝擊。但中國在當前已發展成功，有能力改變困境，故可將傷痛轉成幸福，那就是建立文化緬懷的城市歷史空間，以歷史文化建造不同地標空間，建立一個人文北京。

文化緬懷空間的意義

紐約大學文化與傳媒學者瑪利達史德勤(Marita Sturken) 在其《糾纏的回憶》(Tangled Memories, The Vietnam War, the AIDS Epidemic, and the Politics of Remembering)^[9]中，通過美國經過越戰與愛滋病傳染的傷痛，用一種文化緬懷的方式來醫治和重建。

她開宗明義就說：「緬懷(Memory)構

成人生的交織結構(fabrie)，影響著一切，從簡單日常生活作業的表現能力，到瞭解自我。緬懷建立生命的連續性，賦與現在意義，因現在是由過去所構成。緬懷作為一回憶的方式，使我們知自己是誰，從而產生自我認同的核心」^[10]。

史德勤又說：「緬懷對正確瞭解文化具決定性，因其指出了集體的渴望、需要與自我定義。我們並不需要去問回憶是否真實，而是要從其所述去揭示過去如何影響現在」^[11]，由此而提出「文化緬懷」(cultural memory) 的探討。她認為文化緬懷不同於正規歷史討論，「卻是與文化產品(cultural product) 糾纏一起，而具有文化意義」^[12]。

她所講的文化產品，就是普及文化(popular culture)，如美國對越戰的文化緬懷，不在真實的越戰歷史，卻在電影與電視中的越戰形象。這文化緬懷創造了一種文化上的集體回憶，是一文化上的創造，而非歷史事實的回憶或個人的回憶。文化緬懷構成普及的文化與普及的歷史。

迪奧指出，史德勤的文化緬懷，並不限於傳媒所傳播的普及文化，且也可成城市建設的空間。她指出，當前學界研究認為，作為一種「緬懷政治」(politic of memory)，對過去歷史的故事，必糾纏在「現已存在的城市地形圖(topographies) 及民族歷史中」^[13]。她又說：「政治的、後殖民的與歷史的地理學家們，寫到緬懷政治時，都考查過政治解釋的實踐及可緬懷的地標，包括雕像、街景、牌坊、紀念碑、印記、旅游勝地，城市新發展計劃，居民群體建設，及仍在爭議的地標等，作為民族認同的標記」^[14]。

「當不同的社會群體將其特殊觀點與故事，去解釋過去，銘刻在公眾空間，其後果將會繼續下去。例如通過建造環境，使被壓迫的故事變得更可觸摸，個人或群體可以在產生文化創傷的歷史地方建立值得記憶的場所，去重尋民族的過去，想像一

個更正義的未來」[15]。

在後殖民的年代，中國城市已走出了近代外國欺凌與自身內鬥的文化創傷，在新發展中，也須轉化城市由西方模式規劃形成的創造性被壞，而建造新城市的文化緬懷空間，找尋更多可緬懷的地標，包括雕像、街景、牌坊、紀念碑、印記、旅游勝地，城市新發展計劃，居民群體建設等，作為民族文化認同的標記，醫治過去的創傷，建立未來幸福的盼望。

人文北京的建造

建立一個人文城市，將是城市文化出路。

城市中有很多文化與歷史資源，也有一些具有仁愛情懷的人或組織，但若只放在邊緣，不被重視，則無法建立城市的文化緬懷。人文價值之所以被忽視，原因在當代市場經濟是貿易為本，貿易是一利益交換的世界，交換中可以互相得益。其次，現代商業社會是依工具理性組合，也有一分工制度及機械的行政程序。分工作業，使人性難以完整發揮，形成「異化」的非人性社會。

市場經濟的城市生活，人工作時陷在分工及行政程序中，人的個人創造性受到虧損，形成個人迷失在大體制中的問題。產生人成為工具、人際關係隔離及家庭破壞等問題。此外，整個社會的重心陷在利益交換中，很易產生欺騙及貪污，形成互利及感通關係的破壞。

為了克服現代城市帶來的這種「異化」，設計一個後殖民的城市，必須考慮一個文化的空間，讓城市的景觀設計，可以有文化氣息與仁義精神，使能孕育文化價值的人格。故城市發展不能只是唯利是圖的地產項目，不能只講經濟效益，卻須投資文化與精神文明。

城市本質上是空間設計，計劃周詳的好城市，必有一個好的空間設計。首先在思想文化框架上，通古今中外的大氛圍，城市

空間須「緬懷過往歷史之創傷，關愛當今弱勢之艱困，思念宇宙人生之浩瀚深沉，夢想未來民族之之和諧幸福」，可考慮建立「公眾互動對話空間」、「心靈靜思空間」及「關愛弱勢群體空間」等。建議如下：

1. 公眾互動對話空間——借鏡希臘的廊廳，在城市中心，建立兩層長柱廊的開放空間，可有遮蔭或避雨的和交流的作用，人在其中散步、集會和交流，並進行藝術展覽、文學、歷史及哲學討論等。附近可有半圓而能遮蔭的開放式劇場，作舞蹈表演、音樂演奏、戲劇演出等。

2. 心靈靜思空間——借鏡歐洲大教堂，在幾個風景重點及中心廣場上建鐘樓高塔，旁有一高寬建築，內部高深而莊嚴，兩旁有彩窗設計，配合大油畫及雕像，主題是中西歷史上有崇高人格的道德聖哲及其事跡、重要文學、哲學、宗教及科學家及其事跡。正面則有計算機打出巨大圖片或影片，表達中國及全球各地的壯偉山河，配合低聲浪的和諧優美背景音樂。中間放著多行設計美好舒適的長椅，供人靜思和休息。此外也可在河邊和海邊建開放式的類似靜思空間。

3. 關愛弱勢群體空間——在市中心廣場的某個空間，建一些救弱扶貧者的雕像，如卜式、蓋恣、德蘭修女等，旁有開放式有遮蔭的公開展覽牆，展示當前祖國及世界有災難地區及貧困地區的需要，並呼籲人支持政府及扶貧救災工作的需要。

城市設計時，若能配合建造這樣一個緬懷歷史，推展仁義的文化維度，再配套綠色精神的大樹與公園、多元宗教和諧並存的建築、及各小區發展的關愛與輔導中心，就可抵消世俗化帶來的「異化」危機，建立城市的精神品格，不陷入平面化膚淺的「千城一面」狀況，更不會成為「精神荒原」。

人文北京的活水泉源

北京原就是一個人文城市，春秋時薊

為了克服現代城市帶來的這種「異化」，設計一個後殖民的城市，必須考慮一個文化的空間，讓城市的景觀設計，可以有文化氣息與仁義精神，使能孕育文化價值的人格。

奧運高度成功，全世界已對北京留下深刻好感，北京的使命，將是要建立一種超越西方後現代文化的文化靈魂，走向一個後後現代的義人城市。

國(公元前七七〇至前四七六年)已於現在北京城區西南建城市，燕國滅薊而定都於此，歷代均為北方重鎮，至金朝完顏亮於貞元元年(一一五三年)建為中都，之後元、明、清八百多年，都是京都。中華人民共和國建都北京後，成為現代化都市，二〇〇八年舉辦奧運會，重整全城為一後後現代的綠色與人文城市。

北京在明清兩代，已建立了一種精神品格，如明成祖時方孝孺為氣節而犧牲，明末東林黨鄒元標與馮應京在北京創首善書院，在宣武門內東牆下，建立士人風骨。並在此展開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中西文化對話與交流，一六〇五年利瑪竇在宣武門建天主教南堂，後首善書院建成與之呼應，信徒知識分子如徐光啟、李之藻等，均出入兩邊。知識分子論政與信徒論西學，互相補充，成為一知識分子運動。這是中國歷史第一次中西思想文化的深入交流，就在北京舉行。由此可歸納，明代人文北京之特質，一是士人風骨，一是中西文化和平交流。

清代北京城整體甚有文化特性，李鴻章推行洋務運動，康有為推動維新，六君子為改革而犧牲，均在北京。民國五四運動從北京開始，《新青年》在北京發行，著名作家和知識份子如魯迅、沈從文、老舍、蔡元培、胡適、李大釗、馮友蘭、梁漱溟、熊十力等均在北京發展其思想與作品。此中孕育著對改革或革命的渴求、對人間苦難的關懷、對西方民主與科學的消化、對中國傳統價值的思考及對中國前途的反思等。這是從古文化中展開對現代文明的吸收，也成為知識份子推行改革與革命的發源地，構成了北京城市特有的品格與精神。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天安門宮廷的廣場改建為人民的廣場，使北京具有現代化的城市特徵，並發展工業。鄧小平在北京首推改革開放，影響至巨的「實事求是」精神、「經濟特區」及「一國兩制」亦由北京開始，改革後，多條環城路及高速

公路建成，商業與新科技發展，古宮殿、城牆、城門、胡同與現代具中國特色的高樓大廈交替，城市具有中西新舊交融的特色。「三個代表」、「和諧社會」、「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等新時代方向，均由北京推向全國。

二〇〇八年舉辦奧運，城市重整一新，大力保育環境，改善污染，並建設後現代的鳥巢與水立方建築，使北京走上後現代化之路。奧運高度成功，全世界已對北京留下深刻好感，北京的使命，將是要建立一種超越西方後現代文化的文化靈魂，走向一個後後現代的義人城市。

奧運後的北京，正值中國崛起成世界GDP第二的強國，全球各國均注視中國的成功，是否會對世界產生示範作用。北京作為全國首府，須面對全球各文化的多元性，建立全球不同文明互相交流對話的空間，尋索互相尊重欣賞，和諧並存之道，因而可以化解文明衝突，建立互信互重的全球網絡，而創造和平的條件。這將使北京成為世界文化對話的全球公眾空間。

北京不單要做好中國的榜樣，還須帶有全球使命，發展「後後現代文化」，不陷入西方後現代的虛無主義及自我中心主義中，卻須建立有真、善、美靈魂的中國城市。

1. 首先以天壇為中心，代表自古中國對宇宙終極真理的尊敬。以地壇代表保育大地的綠色理想。這是心靈靜思的空間，是北京的靈魂所在。

2. 以天安門與故宮代表數千年歷史，以四合院代表民間古來文化。這是歷史的文化緬懷空間。

3. 以圓明園及盧溝橋代表近代的掙扎，以黨校中的耶穌會士墓代表中西文明的交匯。以北大清華代表現代文化的吸收，以鳥巢與奧運村代表後現代的北京。這是近代歷史的文化緬懷空間。

4. 以天安門廣場代表後殖民的多元和諧，建立城市中的公眾互動對話空間。

由文化緬懷發展「後現代及後殖民的文化」，須培養一批有文化、有反省、有理想、有仁愛與公義的市民，全力建設人文北京的全球使命。繼承北京自古特有的精神文化，建設有靈性和道德的義人城市。

使古今中外交融，成為中西文明融會的未來指向。

此外，建議北京有更多對文化創傷及歷史偉人的紀念場所：

1. 外國欺凌的歷史，形成文化創傷，可在圓明園建英法聯軍侵略及清末西方侵略博物館，在故宮或歷史博物館旁，建八國聯軍侵華博物館。

2. 在故宮內建中國歷代聖賢學者紀念碑及紀念館，包括孔孟老莊、朱熹王陽明、唐僧利瑪竇、梁啟超馮友蘭、陳寅恪唐君毅等。

3. 在天安門廣場或附近，建歷代偉人紀念碑及紀念館，與人民英雄紀念碑相輝映，特別為國犧牲者與為人民貢獻者，前者如岳飛、文天祥、譚嗣同、張自忠等，後者如孫中山、卜式、詹天佑等。

4. 在清華大學或附近，建立西方人及海外華人貢獻中國的紀念碑，西人如南京大屠殺時的貝拉、魏特琳，華僑如加拿大省督林思齊、南洋陳嘉庚、回國的辜鴻銘等。這是一個關愛人民的空間。

由文化緬懷發展「後現代及後殖民的文化」，須培養一批有文化、有反省、有理想、有仁愛與公義的市民，全力建設人文北京的全球使命。繼承北京自古特有的精神文化，建設有靈性和道德的義人城市。

又把在邊陲的龐大貧困民工的居住、醫療和教育環境改善，建造關愛弱勢群體空間，則將會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結合的最完美城市。

[1] Jane Schneider & Ida Susser, Ed., *Wounded Cities, De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a Globalized World*, Oxford, Berg, 2003 p.1.

[2] Nancy Foner ed., *Wounded City, The Social Impact of 9/11*, 2005.

[3] David Harvey, *The City as Body Politic*,

Ibid, p.25

[4] Karen Till, *Wounded City: Memory - Work And A Place-Based Ethic of Care*, *Political Geography*, 31(2012)3-14, p.5.

[5] Henry Lefebvre, *The Writings on the City*, (Oxford:Blackwell,1996) p.101

[6] 同注4, p.6。

[7] 同上。

[8] Kenneth Leech, *True God, an Exploration in spiritual Theology*, London: Sheldon Press, 1985, p.1)。

[9] Marita Sturken, *Tangled Memories, The Vietnam War, the AIDS Epidemic, and the Politics of Remembering*,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10] 同上, 頁一。

[11] 同[9], 頁二。

[12] 同[9], 頁三。

[13] 同[4], 頁六。

[14] 同[4]。

[15] 同[4]。

Public Space and the concept of a Humane, Cultured Beijing

Dr. Thomas In-Sing Leung, (Chief-Editor, Cultural China)

Abstract: China's ancient Capital of Beijing has suffered a lot of cultural trauma from invasion, political infighting and breakneck development. However, as China h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it now has the ability to remedy this situation, and the solution is to construct a public space for cultural memory of the city of Beijing. This will create a new space for remembrance and healing of this cultural trauma, leading to a humane, cultured space for the residents of Beijing.

Keywords: Cultural trauma, Public Space, Humane and Cultured Beijing